

中國“西方史學史”之史： 歷程·現狀·展望

張廣智

(復旦大學 歷史學系，上海 200433)



[摘要]中國的“西方史學史”源頭，可追溯至20世紀20年代，迄今已近百年。20世紀20—50年代，是中國“西方史學史”的“萌芽時期”。當時它受到了兩股史學思潮的影響，先是30年代前後的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爾後是50年代的蘇聯馬克思主義史學。60年代初，中國歷史學界的“史學史熱”，催生了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的成長，可以說是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奠立時期”。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步入了快車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終於從“自在的”階段進入全面發展的“自為的”階段。展望未來，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之路還很長，但前景璀璨。當下最重要的是，在重繪世界史學地圖的宏業中，如何加速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對此，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者應承擔更艱巨的任務，推動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不斷地開拓與創新。既要深化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內涵，加強對西方史學中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也要在相關專題研究中尋求新的突破，探索與呈現中國特色。祇有在前人止步的地方再出發，從新的起點上前進，才能無愧於中國“西方史學史”事業的前程。

[關鍵詞]中國“西方史學史” 歷史 現狀 展望

[作者簡介]張廣智（1939—），男，江蘇省海門市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從事史學理論與西方史學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克麗奧之路：歷史長河中的西方史學》、《西方史學散論》、《影視史學》、《超越時空的對話：一位東方學者關於西方史學的思考》、《西方史學通史》（導論卷）、《克麗奧的東方形象：中國學人的西方史學觀》，主著有《西方史學史》，主編有《西方史學通史》（六卷本）、《世界文化史》（古代卷）、《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史學之魂：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等。

Titl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the Past,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Abstract: The origin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1920s. The 1920s to 1950s is the infancy period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and it was influenced by two trends of thoughts at that time: the Western bourgeois historiography around the 1930s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Soviet Marxism during the 1950s. In the early 1960s,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craze" among the Chinese historians expedited the growth of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discipline in China. This period can be regarded as its "foundation perio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China in 1978,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has

moved into the fast lane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ultimately it developed from the “stage for itself” to the comprehensive “stage in itself”. Looking to the future,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for the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but that must be a bright futu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moment is how to speed up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owards the globe when redrawing the map for the global historiography. In this regard, researchers of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should assume more difficult tasks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renovation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in China. They not only deepe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discipline in China and strengthen the studies of the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on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look for new breakthrough on the related research subjects and explore and present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history, status quo, prospec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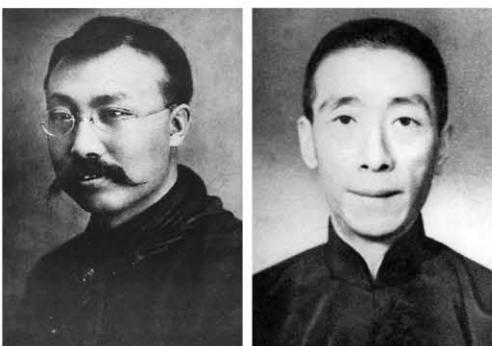
Author: Zhang Guangzhi is currently th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Fudan University.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world cultural history.

就學科意義而言，中國的“西方史學史”還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因為從20世紀60年代初奠立至今，也就五十多年的歷史。但是，倘若考察其歷史源頭，則可以追溯至20世紀20年代，那就有近百年的歷史了。^①歸納起來看，中國“西方史學史”之史，大體經歷了四個時期：（一）萌芽時期：20世紀20—50年代；（二）奠立時期：20世紀60年代前期；（三）停滯時期：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四）發展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由於在“停滯時期”，中國文化尚處於困境之中，遑論“西方史學史”；所以，中國近百年的西方史學史研究進程可概括為萌芽、奠立、發展三大階段，經歷了“不自覺—比較自覺—自覺”這樣一個發展歷程。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詳述以上幾個時期的狀況，而是想從中國的“西方史學史”近百年進程中捕捉幾個要點，另列子題，集中敘述，或許會讓讀者對它多少留下一點印象。

一、在搖籃中

在中國，史學史作為一門學科提出來是20世紀的事。“中國史學史”一詞，最早是胡適（1891—1962）於1924年提出的。然而，就這一學科地位的貢獻而言，當數梁啟超（1873—1929）厥功至偉。自梁氏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明確提出“史學史的做法”，並且為中國史學史設計出初始方案後，中國史學史的作品迭出，30年代前後也因此成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奠立時期。反觀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此時尚處在搖籃之中。

“西方史學史”（或者說“西洋史學史”）一詞最早始於何人，待考。大約在1919年之後，北京大學史學系設置的課程中開始出現“歐美史學史”（或稱“西洋歷史研究法”）之類的內容。1920年起，李大釗（1889—1927）撰《史學思想史講義》，並在北京大學開設“史學思想史”等相關課程，但着力傳授的是近代西方史學史（雖然他並沒有標上這樣的名稱），為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做出了先行者的貢獻。在此需要加上一筆的



李大釗

何炳松

^① 參見張廣智：“導論”，《西方史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張廣智：“西方史學史學科在中國的歷史進程述要”，《福建論壇》1（2010）。

是，《史學思想史講義》也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西方史學史作品。在這之後，何炳松（1890—1946）與郭斌佳翻譯了美國歷史學家紹特威爾（J. T. Shotwell, 1874—1965）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把中文譯名定為“西洋史學史”，由商務印書館於1929年出版，也許他們是在學術界較早提出此詞的人。1930年，北京大學史學系在開設的課程中，已明確有“西洋史學史”一課。此後，清華大學的劉崇鋐（1897—1990）、暨南大學的朱謙之（1899—1972）都開設過這樣的課目。於是，在30年代，“西洋史學史”一詞逐漸流傳開來。

然而，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作為一個學科仍處在搖籃之中。原因在於，儘管有“西洋史學史”之類的譯作流傳於坊間，但它還沒有像“中國史學史”學科那樣，產生如金毓黻（1887—1962）的《中國史學史》之類的典範作品；國人關於西方史學史的著述，也祇是在“史學概要”這類書中有簡略的介紹，並未形成系統；至於像周予同（1898—1981）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之類的研究型論文，也尚未問世；而個別高校開設的“西洋史學史”課目，在當時寥若晨星，不成氣候，故還談不上此類人才的培養。所以，從總體上看，此時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作為一個學科還不成熟，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

二、徘徊於兩股史學思潮之間

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一直受到域外史學的深刻影響；而縱觀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發展歷程，尤其如此。這一方面由於它的根底薄弱，另一方面是因為這門學科的自身特點，因而它在建立過程中較“中國史學史”更易受到域外史學直接乃至無法擺脫的巨大影響。雖然中國學者對它的探索鍥而不捨，但也祇能是步履蹣跚地行進。

在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萌芽時期，對它產生重大影響的域外史學主要有兩支：一支是西方史學，另一支是蘇聯史學。

（一）20世紀30年代前後輸入中國的西方史學

說起西方史學在20世紀的直接東傳（不是借助東鄰日本），大體說來有兩次高潮：一次發生在30年代前後，一次發生在80年代。作為第一次高潮的重要標誌，是大量輸入了西方史學原典作品。它包括兩類：一類如卡萊爾（T. Carlyle, 1795—1881）的《英雄與英雄崇拜》、馬基雅維利（N. d. B. d. Machiavelli, 1469—1527）的《霸術》（現通譯為《君主論》）等歷史著作；另一類則數量衆多，屬於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如魯賓遜（J. H. Robinson, 1863—1936）的《新史學》、朗格諾瓦（C.V.Langlois, 1863—1929）與瑟諾博斯（C.Seignobos, 1854—1942）的《史學原論》、斑茲（H. B. Barnes, 1889—1968，現通譯為“巴恩斯”）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的《歷史哲學》、伯倫漢（E. Bernheim, 1850—1942）的《史學方法論》等。與此同時，諸多西方史學流派也湧入進來。是時，以魯賓遜為代表的現代美國“新史學派”、蘭克（L. V. Ranke, 1795—1886）與“蘭克學派”史學、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文化形態學派、新康德主義等都無須借助他國而直接步入東土。

西方史學的輸入在現代中國史學界激起了廣泛的迴響，這以當時出版的國人著述可為之佐證。例如，何炳松的《歷史研究法》、朱謙之的《歷史哲學》、盧紹稷的《史學概要》、翦伯贊（1898—1968）的《歷史哲學教程》、林同濟（1906—1980）和雷海宗（1902—1962）的《文化形態史觀》等等。通觀這些著述，多數是借鑒吸收西方的史學思想，有的甚至是根據西方史學原著的改寫。但不管怎樣，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的輸入，無

論是在中西史學交流方面，還是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方面，都起到過相當積極的作用，雖然也不可避免地帶來食洋不化與生搬硬套的毛病。

（二）20世紀50年代輸入中國的蘇聯史學

1949年以後，現代中國史學發生了“路標的轉換”，即從前一時期引進西方史學向引進蘇聯史學的轉變，從汲取西方資產階級史學向學習馬克思主義史學（實質上是打上斯大林印記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轉變。這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進程中，可稱之為一次新的史學革命，影響深遠，意義不凡。如今，雖然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已不復存在，但它的史學作為一份遺產並未隨之消失，還需後人認真總結，批判繼承。由於這是歷史學研究的一個大題目，需要另文詳述，這裏我祇就題旨略說一下。

“以俄為師”、“向蘇聯學習”，是中國人20世紀50年代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當時，中國史學界因學習馬克思主義及其唯物史觀而“愛屋及烏”，對蘇聯史學也大加推崇與讚美。因此，有多種途徑輸入蘇聯史學：俄文史學著作紛紛翻譯出版；蘇聯學者來華講學；中國學者在學校課堂上的講授；中國留蘇學生歸國後的宣傳，等等。倘若與30年代前後那一次西方史學的輸入相比，有兩點是共同的：一是翻譯著作均居於首要地位。無論是《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還是多卷本的《世界通史》，即使是很專業的康恩（И. С. Кон, 1928—2011）的兩本史學理論作品（《哲學唯心主義與資產階級歷史思想的危機》、《窮途末路的資產階級歷史哲學》）的譯本，都在國人或學術界中產生了重大影響。二是留學生在引進域外史學中起了重要作用。不管是前一次的何炳松還是此次的“何炳松們”，都扮演了“馬前卒”的角色，其溝通與交流的作用不可或缺。

50年代輸入的蘇聯史學對中國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專業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從宏觀方面說，是烙上了明顯的教條主義與僵化的印記；從微觀方面說，即使是具體的學科體系，也無不留下這種蘇式歷史理論的痕跡。康恩書名中的“危機”、“窮途末路”云云，很能代表那時蘇聯史學（尤其對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的認識等）的“主體意識”。因此，食洋不化與生搬硬套的弊端，始終貫穿於這次大規模的域外史學輸入中。當然，蘇聯史學入華也有它的積極意義。歷史地看，在那個特定的時期，中國學者借助蘇聯史學，部分地窺探到西方史學的面貌和進展，儘管這種從夾縫中看到的東西或模糊、或扭曲。這也反映出，此時的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還處於萌芽期、搖籃中。正是處於這種“自在的”階段，所以對這門學科的總體認識還不夠自覺。

三、“史學史熱”催生了一門學科

在中國奠立“西方史學史”學科，“全盤西化”不行，“全盤蘇化”也不行。這是因為，我之所求，未必是人之所予；人之所予，未必是我之所求。所以，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在構建初期，借助外力是必要的，但它終究不能起到支配作用，內力仍是左右這門學科的一種決定性力量。

這種內力終於來了。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不睦，“左”傾思潮受阻，重申在學術上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一較為寬鬆的時代氛圍，使當時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界出現了一種求新務實的學術思潮。哲學領域的“合二而一”、文學藝術領域的“人性論”和“時代精神匯合論”等新論競相提出，無一不對史學界產生重大影響，一度出現了科學思潮的勃發，成了“文革”前十七年中國歷史學發展的最好時期。這也引發了歷史學界對歷史學自身的反省，形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史學史熱”。

60年代初發生的“史學史熱”，以1961年4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會議

(“史學史”被列入教材計劃)為標誌。在此前後，史學界頗為活躍。在北京、上海、廣州、濟南、武漢、西安等地，中國史學工作者就史學史研究的各個方面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收穫甚豐。單就“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而言，正是這次史無前例的“史學史熱”催生了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功莫大焉。

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奠基，大體說來，需要具備以下一些條件：

第一，認識到西方史學史的重要性，並把它列入高等院校歷史學系的教學計劃；

第二，相關教材的編纂計劃及其實踐；

第三，該學科研究生的培養計劃及其實施；

第四，西方史學原著的譯介；

第五，國人研究西方史學史達到相當的水平。

以上諸項，在60年代前期大體齊備了。正是當時中國史學界對西方史學史這門學科有了一種比較自覺的認識，說明這門學科在中國已初步建立起來了。

四、“南耿北齊”

中國歷史學界所謂的“南耿北齊”，指的是復旦大學的耿淡如（1898—1975）教授與北京大學的齊思和（1907—1980）教授。之所以將他們並列，是因為兩人有許多相似之處：

他們均留學美國，同在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前者於1932年回國，後者於1935年歸來；

他們在1950年後，皆以治世界中世紀史而享譽新中國史壇；

他們都致力於西方史學的輸入，積極翻譯西方史學名著；

他們都是60年代初“史學史熱”的中堅人物；

他們都是60年代初高等教育部籌劃的全國通用教材《外國史學史》一書的編寫成員；

他們都在60年代初發表了為奠建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做出貢獻的學術論文。

最為重要的是，前述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奠立所應具備的條件，無一不與耿、齊兩位前輩有關，尤其與耿淡如教授有着緊密的聯繫。

在60年代前期，耿淡如教授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做了許多奠基性的工作，現擇其要者，稍微具體化如下：

1961年，在《學術月刊》雜誌發表《什麼是史學史》一文，提出“需要建設一個新的史學史體系”。

從1961年開始，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為本科生開設“外國（西方）史學史”課程。

1961年，被高教部任命為《外國史學史》教材的主編，並努力付諸實施（這項工作，後因“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中止）。之後，積極翻譯西方史學名著，成就出眾；又選譯西方著名史家與流派，輯成《西方史學史資料》，內部刊用；在《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雜誌持續發表譯文，介紹西方史學。

1964年，招收國內首名“西方史學史”專業方向的研究生。

可以這樣說，耿、齊兩位教授在那時困難的條件下，為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的奠立做出了開創者的貢獻。上述各項，均因“文化大革命”運動而中輟，“革命風暴”無情



耿淡如（青年時代）



齐思和

地扼殺了搖籃中的幼兒，把尚處在奠立時期的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摧垮了。

五、東隅已逝 桑榆未晚

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步入了快車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終於從“自在的”階段進入全面發展的“自為的”階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老一輩治西方史學史的學者，返老還童，奮發有為，成了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以吳于塵、郭聖銘、朱本源、譚英華、張芝聯為例，儘管那時他們都已步入花甲之年，然而“東隅已逝，桑榆未晚”，個個老而彌堅、精神抖擻地投入到西方史學理論與西方史學史教學和研究工作中，業績非凡，竟然成了他們個人事業的一個巔峰期。

吳于塵（1913—1993），武漢大學教授。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他積極倡導整體的世界史觀，為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他與周一良共同主編《世界通史》，影響深遠。他於西方史學史領域頗多精論，見其論文集《吳于塵學術論著自選集》等。他主編的《外國史學名著選》（上下兩卷），迄今仍嘉惠史林。

郭聖銘（1915—2006），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他於世界史領域多有建樹，著有《世界文明史綱要》古代與近代兩卷等。1983年，他出版了《西方史學史概要》，在學界影響深遠，迄今未泯。在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之史中，《西方史學史概要》是一個零的突破，乃中國學者所寫的有關西方史學史的開山之作。

朱本源（1916—2006），陝西師範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西史學理論與方法的比較、西方史學史研究，著有《朱本源史學文集》、《歷史學理論與方法》等。1978年，他開始了學術人生的新起點，一鼓作氣工作了二十年，成為他個人學術生涯中的“黃金時代”。

譚英華（1917—1996），四川大學教授。1984年，他是當時國家教委組織的全國通用教材《西方史學史》的副主編（主編是張芝聯），撰寫的“導論”，涉獵廣泛，立論精深，是一篇可以獨立成章的西方史學史專論。他於近代英國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尤有研究，《試論博克爾的史學》等文，堪稱這一領域的經典之作。

張芝聯（1918—2008），北京大學教授。他於法國史和西方史學史兩個領域均有建樹，成果纍纍；曾主編《法國通史簡編》，西方史學史和法國史研究的論文甚豐，結集的有《從高盧到戴高樂》、《從通鑑到人權研究》等。在新時期，他穿梭於東西，往返於中外，充當“學術交流大使”二十餘年，為中外史學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

逝者如斯，風華不再，後來者唯有在這些前輩歷史學家的基礎上再出發，不斷進取，繼續耕耘，才不致愧對先人，不致愧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事業的前程。

六、繁花似錦的新篇章

回顧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西方史學史”這三十多年的歷程，之所以稱其為“發展時期”，是因為與前面相比，表現出了明顯的進步，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裏略舉一二：

20世紀80年代以降，發生了20世紀第二次引進西方史學的高潮，它大大超越了第一次。

中國學者研究西方史學的水平從介紹到評述再到深入，取得了明顯的進步。

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尤其是人才培養，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在上述幾個方面繼續得到發展，其發展總趨勢是不斷擴展、深入。

近三十多年來，最能顯現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進展的是國人撰寫的西方史學史著

作如花似錦，層出不窮。這裏且不說西方史家或學派的個案研究，比如從李勇的《魯賓遜新史學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到陳茂華的《霍夫施塔特史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等；也不說西方史學某個專題之作，比如從江華的《世界體系理論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7）到周兵的《新文化史：歷史學的“文化轉向”》（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等。這裏主要想說的是通史類的西方史學史著作，據我粗略統計，從1983年郭聖銘首先推出《西方史學史概要》到現在，大約有二十多種。這對於比較薄弱的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來說，是來之不易的。通史類西方史學史作品的迭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水平。“動人春色不須多”，在此列舉數種，以現花團錦簇之景觀：

著作名	作者或主編	出版年
《西方史學史概要》	郭聖銘	1983
《西方史學史綱》	宋瑞芝（主編）	1989
《西方史學的源流與現狀》	徐正（主編）	1991
《外國史學史綱要》	夏祖恩	1993
《西方史學史》	楊豫	1993
《外國史學史》	王建娥	1994
《西方史學史》	郭小凌	1995
《西方史學史》	張廣智（主著）	2000
《西方歷史編纂學史》	何平	2010
《西方史學通史》（六卷本）	張廣智（主編）	2011
《西方史學史》	于沛、郭小凌、徐浩	2011

無須多加說明，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在“發展時期”的發展情況就盡顯其中了。

七、在新的起點上再出發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浪潮席捲世界，方興未艾。作為當代歷史發展的新潮流，它衝擊着世界，也衝擊着中國，順時代潮流者昌，逆時代潮流者衰。這給中國帶來的不祇是巨大挑戰，也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這自然也包括志在快步邁向世界的中國史學，尤其是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總的看來，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前路漫漫，前景璀璨。當下重要的是，如何在前人到達的地方再出發，從新的起點上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

首先，為了使中國史學躋身於世界史學之林，必須重繪世界史學地圖。

如今，“世界文學”、“世界哲學”已成為現實，那麼，“世界史學”也並不是一個烏托邦。為此，中國史學工作者的任務繁重，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加強翻譯，“外譯中”與“中譯外”要齊頭並進，對後者尤其要格外重視，以讓世界進一步瞭解中國史學；又如，建立或舉辦一些能在國際學術界發出中國史學家聲音的平臺、會議等，讓中外學術界進行平等對話與交流互動；再如，中國學者要拿出自己的“拳頭產品”——足以讓國外同行為之服膺的學術精品，而不再是為洋人洋說提供材料的“學術小工”等等。但最緊要的，還是把重新繪製世界史學地圖提上議事日程。其中一項實質性的具體工作，就是編纂



一部《世界史學通史》。

對於編纂《世界史學通史》，前輩學者早有夙願。1961年，我的老師耿淡如就提出了編纂“世界史學通史”的設想，在當時猶如空谷足音，惜未能激起更大的迴響。到20世紀80年代，又有前輩提及，也未能付諸實施；非不爲也，乃不能也，條件尚未成熟。如今，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已取得長足的進步，六卷本《西方史學通史》也展現在學術界。當然，西方史學畢竟是世界史學通史的一部分（也許是主要部分），但編纂《世界史學通史》與編纂《西方史學通史》在貫徹“通史”旨趣上並無二致，故《西方史學通史》對於寫作《世界史學通史》仍有一些參考價值。當然，編纂一部《世界史學通史》殊爲不易，因爲它沒有現成的東西可以照搬，但我們不能坐等一切條件都已具備再來書寫。爲了重繪世界史學地圖，也爲了讓國際史學界瞭解中國史學及其在世界史學地圖中的位置，我們沒有理由說放棄，祇能不斷前行，永不止步。

其次，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需要深化。

一是深化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內涵。自梁啓超在20世紀20年代爲“史學史的做法”創設初始方案後，梁氏方案的模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左右了國人中國史學史的寫作，這自然會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寫作帶來影響。晚近以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超越梁氏之架構且顯示其深意的中國史學史新作不斷問世，這對深化西方史學史的內涵必定有參考價值。與此同時，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者也在積極探索，尋求新的路徑。例如，重視中外史學交流史的研究，重視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研究，重視史學史之史的研究等等，都有助於“西方史學史”學科的開拓與創新。倘如是，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內涵就可不斷得到深化；這些新的研究領域的開闢，也同時會促使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外延不斷得到拓展。

二是探求西方史學的中國特色。“西方史學，中國眼光”這一宗旨，正是國人汲納西方史學、發展中國史學時應有的立足點，也是中國的“西方史學史”未來發展的期盼和孜孜以求的目標。爲了達到這個目標，這裏特別要強調“比較研究”的重要性。世界史學之優劣，必須通過比較，方能顯現。在世界史學史上，祇有中西史學能夠互爭雄長，相互媲美，“所以將中西史學放在一起作比較，是比較史學中最急要最能有發現的工作”^①。不管怎麼說，“西方史學，中國眼光”應該是中國學者的正確選擇，更應成爲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一種上佳方略。

三是在西方史學的專題研究中尋求新的突破。通史性的西方史學史作品，人們已見到不少。在我看來，當下更應關注西方史學史專題性的研究著作，因爲它是前者豐潤的基礎，否則通史性的西方史學史作品都流於一般性的介紹，還談什麼深化。在這裏，我特別看好以西方史學史某一個案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從那些經多年磨一“劍”的論文中，往往會發現佳作。我曾經對已出版的以20世紀西方史學爲專題的博士學位論文做過調研，上述結論即由此產生，且深信不疑。^②

四是加強西方史學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關於這一點，筆者受到河南大學李振宏教授論見的啓發。他在談到開闢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局面時說，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都必須在學科領域中的重大理論研究方面取得進展，用深度理論思考提升學科的科學化水平。繼而他談到了歷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歸納爲下列三條：時代發展推進歷史學進步；歷史觀

① 杜維運：《變動世界中的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第51頁。

② 張廣智：“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的中國聲音——以近十年來青年學者的相關論著爲中心”，《探索與爭鳴》7（2013）。

變革推動史學的發展和進步；個人修史創造傳世名作。^①既然說這是歷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那一定包括中外（西），也適用或大體適用於西方史學發展的基本規律。不過，就我個人於西方史學發展的考察，除了上述三條，似乎還可增加兩條：西方史學史上每次史學的重大轉折都有力地推動着西方史學的進步；歷史學自身的反省是史學不斷開拓與創新的強大動力。這增補的兩條，是否符合中國史學的歷史實際，我不敢妄下結論。其實，我與李振宏教授有同樣的感受，既感到這個重大理論問題的重要，又顯得非常不自信，生怕沒有說到點子上。不管怎麼說，加強對西方史學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一定會有助於西方史學研究的深化與學科的發展。

再次，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之前途寄希望於年輕一代。

2008年，隨着張芝聯先生的謝世，中國“西方史學史”研究的接力棒傳到了年輕一代。有道是，未來是屬於青年的。同樣，中國史學的希望也寄託在他們身上。作為張芝聯先生學生輩的我們這些人，如今也已進入古稀之年，重任自然要落在更年輕一代人身上。我借此一角呼籲，為發展中國的“西方史學史”計，必須大力加強西方史學史人才的培養，重視西方史學史的學科建設。

最後，寄語中國的年輕一代史學家：

為彰顯中國史學的個性特色而努力；
成為中外（西）史學交流的急先鋒；
在重繪世界史學地圖中做出重要貢獻。

再過六七年，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發展將走滿百年行程。可以期待的是，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家將不負衆望，努力耕耘，鍥而不捨，以出色的成就迎來第二個百年的開啓。時代正走在新的跑道上，中國史學新時代的曙光已升起在歷史的地平線上，讓我們共同努力，以無愧於這個時代、無愧於中國史學。

[編者註：該文係作者於2013年12月7日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西方史學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上所作的主題發言；應編者之邀，作者經整理後刊發於此。]

^① 李振宏：“開闢中國史學史研究新局面的思考”，《史學月刊》8（2012）。